

# 電子決策劇場：資訊社會公共決策創新的工具形式

朱國偉\*、徐曉林\*\*

## 一、引言

社會發展的一個鮮明趨勢是，我們正越來越遠離農業社會的確定性生活，而步入了後工業社會或資訊社會之中，並面對著複雜性所帶來的諸種風險。如果說工業社會是一個依賴技術的時代，那麼後工業社會的複雜性不僅沒有降低對於資訊技術的需求，反而強化了這一事實。資訊技術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化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系統的結構性構成。因而，面對風險社會的來臨，我們必須依賴於資訊技術的發展並且將這一技術納入公共問題解決或公共決策過程之中來，才能實現更為有效的公共治理和社會回應。而本文的任務則在於，以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的電子決策劇場實踐為範本，在這一決策技術趨勢下做一理論性的分析。以揭示這一技術形式的前景和可能的限制。

## 二、電子決策劇場及其在公共決策系統中的存在形式

作為一種資訊化時代的技術產品——電子決策劇場（Electronic Decision Theater）是一種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立體互動式的視覺化的智慧決策支持平台。它採用高端資訊處理顯示裝置，利用虛擬實境、人工智慧、系統工程、決策理論等資訊技術與方法，為決策問題分析、決策方案設計、決策過程監控、決策效果評估等決策環節提供視

\* 朱國偉，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

\*\* 徐曉林，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博士、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

覺化的決策支援服務。它由智慧人機介面，問題處理系統，知識庫系統等構成，其主要硬體包括：多通道圖像服務系統、立體背投柱幕系統、視頻播放系統、視訊會議系統、中央集成控制系統、高性能電腦集群運算系統、大型資料中心等等。<sup>1</sup>它可以應用於大型專案規劃與管理，輿情分析與應對，危機應急管理，能源管理，水、土地等自然資源管理等多個領域。

“現代化、科學化的公共決策系統（政策系統）是由資訊、諮詢（參謀）、決斷、執行和監控等子系統所構成的大系統。”<sup>2</sup>公共決策是一個為了解決公共問題，方案優選的主體互動過程。電子決策劇場所對應的是泛在的資訊網路，這使它可以應用於不同層級的公共決策支撐系統。同時，它也不限於方案決策這一環節之中。公共政策本質上是一個集體選擇的過程，即從一個政策週期的角度來看，在公共政策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都存在著公共決策行為。也就是說，我們所謂的公共決策是在政策問題的界定、政策方案的選擇、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工具選擇、政策調適或終結等環節之中多元主體的互動過程。電子決策劇場集合了資訊收集、決策諮詢、方案會商、執行協調、績效評估等功能，作為一個多系統的整合它是決策資訊、決策方法和決策過程的統一體。因而成為公共決策系統的全過程技術支援機制。

### 三、作為工具理性形式的價值意義

對於決策者來說，“當評價一項政策時，弄清那些目標是否值得去完成。似乎需要一個比‘符不符合我的利益’更高尚的衡量標準。”<sup>3</sup>雖然，對於何為公共利益，誰之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政策問題以及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對於公共決策價值的公共性要求一直存在。然而，“不考慮手段就表示是不嚴肅地對待目

- 
1.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電子決策劇場：為科學民主決策導航”，《諮詢與決策》，2011年（2），第44-50頁。
  2. 陳振明：《政策科學》，第7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陳振明教授將公共決策系統與政策系統等同起來。
  3. [美]詹姆斯·安德森著，謝明等譯：《公共政策制定》，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

的。”<sup>4</sup>公共決策對價值理性的追求必須借助於工具理性原則來實現，工具與目標之間的脫節，必然使價值理性的實現成為空中樓閣。使公共決策目標成為“柏拉圖式”的、盲動的追求。<sup>5</sup>公共決策不僅是理論科學更是實踐科學，是一種“技藝”，有著自身的行為方式和工具理性要求。電子決策劇場作為一種技術安排，它是工具理性的表達。雖然，公共決策的理性主義因主體理性能力的限制以及決策問題的動態性和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而受到質疑。然而，這一質疑並沒有否定理性決策的意義，而只是推動著理性主義的決策方式不斷優化。

政策問題作為一種事實雖客觀的“存在於個人意識之外，有一種必須服從的強制性力量，而不管個人是否願意接受。”<sup>6</sup>但是，對事實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不是簡單的意識活動，需要工具、技術的支撐。從“實然”通向“應然”亦需要借助於工具理性原則下的手段與技術。為了證實與權衡這些價值，瞭解工具選擇的價值實現程度，也需要一種技術或者工具理性的支援。尤其在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環境下，不借助於技術手段公共決策人員就會陷入資訊的垃圾桶而無所適從。電子決策劇場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可以提高事實理性活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效能，有助於公共決策主體準確瞭解政策生態，以權變的行為方式回應不同的環境，增強公共決策主體及政策系統的環境適應性能力。而這緩解了我們在純粹的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要求之間的衝突。

電子決策劇場將決策資訊盡可能的收集完整，實現最大可能的理性化。整合歷史與現實資料資源，整合府際資訊資源，對備選方案進行全面掃描，通過視覺化的比較實現方案的優選。換言之，它可能強化理性主義的決策模式，但是，作為一種公共選擇的過程，這裏的理性不再是有限的個體理性而是作為集體理性下的理性優化。由於不同階層、知識背景以及價值觀念的決策主體的介入，政策決策系統成為

---

4. [美]約翰·杜威著，傅統先譯：《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係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2頁。

5. 朱國偉：“公共行政理性範式的歷史分析與三維理性範式構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2008年哲學年會論文集》，2008年，第125-131頁。

6. [法]迪爾凱姆著，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4頁。

一個開放決策迴圈。決策的價值標準可能是組織的、個人的、專業的以及政治的，但在互動過程之中實現了理性的妥協。最終實現了公共理性的局面。這不僅是對決策主體有限理性的優化，也是對依靠技術手段決策這一工具理性行為的價值補充。

可見，電子決策劇場的技术應用可能強化理性主義的決策觀，但是又不能將之歸為單純的理性主義形式。它既通過理性的方式實現方案的比較與優選，也以漸進調適的方式不斷適應決策環境的變化，同時它還具有即時決策或應急決策的能力，以適應突發性公共問題的出現。因而，它是多角度的政策分析的結合，是政策願景分析的現實化方式。可以說，電子決策劇場模式是多元決策觀的技术表達。

#### 四、作為公共決策體制變革的一種動力

公共政策決策並不是一個技術磨練，而是一個固有的政治過程。

正如西蒙所言：<sup>7</sup>決策是行政的心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公共決策體制就是政治—行政體制。<sup>8</sup>而決策技術上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準以及公共決策體制現代化以及科學化水準的標誌之一。自1986年我國就正式提出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問題<sup>9</sup>，並將其納入政治體制改革的範疇之中。而對於科學技術的運用與資訊支援系統的建設一直是我國公共決策體制優化與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與作為政策執行階段的政策工具不同的是，公共決策系統的工具形式更多地是指技術手段。但它可以作為政策執行工具輔助的機制。作為一種治理的技術手段，電子決策劇場又可以作為資訊社會公共治理主體的“大腦”，是實現公共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政策執行效力的智慧核心。

- 
7. [加]邁克爾·豪利特等著，龐詩等譯：《公共政策研究：政策迴圈與政策子系統》，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40頁。
  8. 陳振明：《政策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1頁。
  9. 萬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700/4495262.html#>，1986年7月31日。

公共決策體制是一種決策權力配置關係。公共決策是一個權力或影響力的複雜的互動過程。<sup>10</sup>如果說決策體制的改革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以及權力重組過程，而較易受到決策系統官方決策者抵制的話，技術形式的變革則是一個較為容易接受的路徑。電子決策劇場則成為公共決策系統革新的一個周邊動力機制。因為，它不需要政府官員放棄自己的決策權力，而是塑造了一個新的、來自於社會的權力群體。它以反向推進的方式重新分配著決策權力，優化著決策機制，推動著決策體制的變革。作為一種資訊技術的運用，電子決策劇場可以實現無差異的公民參與，打破層級性參與以及階段性參與內在的弊端。在複雜網路中多邊導向的決策結構通常會構成一種結構偶發類型的治理。這迫使政策制定者必須對政策網路中的多元一致性、獨立性以及互賴性予以認同，並且決定作為主要的行為者進行協商。也就是說，需要尊重政策網路的結構。<sup>11</sup>同時，它通過改善決策主體的行為方式以及決策資訊的傳輸交流方式，使公民可以將決策意願直接傳至決策層。消解了官僚制組織的中間層級功能，促進了決策組織結構的變革。進而，公共決策的技術創新將引致了整個公共決策系統的革新，而不能僅僅將其置於手段層面來加以考量。

在資訊化社會，公民借助於網路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參與到公共決策過程中來。有效地消除了由於資訊的人為阻滯和時空限制，及其資訊傳遞失真和資訊遲緩所引起的決策滯後和決策失誤等問題。同時，依賴於雲計算、智慧感知等技術的電子決策劇場，可以平衡公民表達能力的差異，尤其是在資訊社會之下的資訊能力的差異。這實現了由公民發起的接觸，促使由政治和行政官員主導的政策議程轉變為政府與公民的互動，由單邊決策轉變為多邊決策，多邊治理。此時，“政府決策層作為決策的支援系統，雖然在決策過程中仍居主導地位，擁有對各種決策方案的最終裁定權，但是政府決策層在整個決策系統中的地位已經由‘唯一’變成了‘部分’。”<sup>12</sup>而且因

---

10. [美]查理斯·林德布洛姆著，竺乾威等譯：《決策過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47頁。

11. [美]蓋伊·彼得斯等編，顧建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8頁。

12. 徐曉林等：《電子政務》，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8頁。

其主動收集公民的需求表達，及其動態跟踪其變動，不再被動地依賴公民的表達。實現了主動的、積極的公共治理與公共決策模式。此時的公共決策使公民從有意識地參與到無意識地參與。改善了公共決策系統的滯後性以及機械化的反應模式，也提高了公共決策體制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能力。

## 五、作為公共決策過程優化的一個路徑

傳統的認為，公民的政策參與有損於公共決策的效率性，尤其是大規模的公民參與由於協商成本的高昂往往是不可取的。但是，電子決策劇場集成了公共資料中心、政府資料庫、專家資料庫、決策模型庫、決策案例庫以及移動電子政務應用等模組。通過專用伺服器與協作軟體，實現資料庫間遠端連接與互動。使本地和遠端的決策參與者充分利用決策支援環境共用資訊，交換意見，為群決策和分散式決策提供平台。其資訊處理能力和計算能力，使公民參與的規模限制不再是公共決策最為擔憂的問題。可以實現公共決策全過程最大限度的公民參與，實現整體性的公民協商決策。而且由於互動式的、可修正的系統設計，使政策方案的調節與選取可以及時的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價值結構變化作出修正。互動式視覺化決策使公民或利益相關者持續地關注公共會議和決策議程。利益相關者可以借此向公共部門表達自己的需求。劇場將決策方案利益相關人的衝突點以螢幕展示的方式標示出來。通過利益衝突建模將折中方案的損益值數量化的表達。實現決策主體之間以及決策主體與決策環境、決策問題、決策目標之間持續性的交互和動態的決策。

電子決策劇場形成了一種非共同在場的“虛擬政策共同體”。它的高速運算技術使它可以適應不同規模的共同體。作為利益和觀念聚合的載體，將官方和非官方的決策主體彙集到一起。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就如阿倫特意義上的一個公共空間將不同訴求的公民聚集在一起<sup>13</sup>，隨著公共問題的形成與解決而形成和解體。特別是虛擬實境

---

13. [美]漢娜·阿倫特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第4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Virtual Reality) 技術的運用<sup>14</sup>，使複雜環境下的協作各方或者協調主體形成虛擬在場的網路結構，對各種非結構化與非常規化的問題做出決策。而這種虛擬在場的特性弱化了由於資訊不對稱引起的決策主體的不平等地位，使平等協商及多元合作的治理成為可能。而且，在電子決策劇場這一平台下的主體集聚的政策網路中，“由於網路內部密集的互動，合作網路中的行動者可以更快地瞭解新技術、機遇、挑戰以及交易結果等。他們學習的品質很高，因為不同觀點和背景的人可以在水準層面上對需要學習的東西進行探討和辯論。社會資本增強了人們構建以及使用資訊資本的能力”。<sup>15</sup>這一互動參與的過程不僅是型塑政策問題的階段，作為政策試探的一種方式，也是政策行銷和生產公共政策資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共政策問題得到了更為明晰的闡釋，政策目標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擴散和傳播，它增強了公共政策的社會合法性，也提高了其可行性及其執行效率。對於各利益相關者而言也是一個政策學習的過程。

## 六、作為公共決策能力提升的一種方式

資訊社會下面對結構不良的問題，公共決策需要更多的戰略性和更為快速的反應能力。這要求我們必須對問題情境的感知更為敏感，更為準確地解決正式的或實質政策問題。這就需要更為精確地收集多源的資訊流，實現更為快速地回應。而問題邊界的不確定性，使得公共決策也成為持續性的存在，實現公共決策議程的動態設定，並使公共決策更加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而這一問題的關鍵環節則在於公共決策的精確性與效率性。

傳統資訊支援系統以模型的定量計算為核心，而電子決策劇場對於人工智慧技術的運用提升了對非結構化問題的處理能力。對複雜問題以及突發事件等非線性決策環境，電子決策劇場採用網絡技術與雲

---

14. 虛擬實境技術是借助於電腦技術及硬體設備，實現一種人們可以通過視、聽等手段所感受到的虛擬環境。它不僅僅是一個媒體或高級使用者介面，而是為解決工程、醫學、軍事等方面的問題而開發設計的應用軟體。見徐曉林等：《電子政府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頁。

15. [美]簡·芳汀著，邵國松譯：《構建虛擬政府：資訊技術與制度創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6頁。

技術可以實現計算資源、存儲資源、資料資源、資訊資源、知識資源、專家資源和設備資源的全面共用。用網路把地理上廣泛分佈的各種計算資源，包括雲計算平台，超級電腦和視覺化系統等互連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超級計算能力，實現資訊的高度融合和共用。滿足複雜決策模型的即時運算需要，大大提高決策的效率。<sup>16</sup>通過融合定性與定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採用問卷調研、專家訪談、因果關聯分析、模型研究、模擬實驗、資訊融合等分析方法。將問題層次及問題之間的相關性通過資料建模，以三維影像的方式互動式的展現出來。縮短了公共決策的周期，避免延誤決策時機，幫助決策群體做出高效、滿意的決策。

精確的規則與對新情況的創造性回應一直是公共決策的困境。因為，我們絕不可能充分預見到未來的情況，因而也就不可能起草那些面向新事實、新技術和新環境的規則。此外，一旦新的環境變成了現實，人們也一定會修正乃至改變他們的目標。精確的規則常常會滯後於環境和目標的變化。<sup>17</sup>而電子決策劇場通過整合地理資訊系統，依靠感測器網路、資訊感知、位置跟踪、資料圖像採集、資訊挖掘以及物聯網等技術手段，收集決策利益相關者或政策目標群體各種資訊。實現了無處不在的資訊跟踪服務。可以發現公民需求的動態性，有效地進行政策目標群體的識別與區分，實現更為具有針對性的決策互動，並對關鍵群體進行態度和意見跟踪。實現了決策資訊的即時更新和決策方案的動態調適。利用模擬系統、控制系統、信號處理等系統，實現決策的分析、建模、模擬。使公共決策在精確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悖論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化解。

## 七、作為公共決策品質改善的推進機制

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決策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什麼才是公民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判斷公民或社會需求的“真”與“假”，區分政策的議題與非議題，以及如何協調好當前需求與未來

---

16.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電子決策劇場：為科學民主決策導航”，《諮詢與決策》，2011年（2），第44-50頁。

17. [美]黛博拉·斯通著，顧建光譯：《政策悖論：政治決策中的藝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5頁。



需求的關係。媒體輿論的興起，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是根據媒體所塑造的公眾意見或者所報導的膚淺而娛樂化的事件。“這些討論由一個事例或一系列事件所激起，而非由年復一年、一個純粹任意的和儀式化的公共話語安排所激發。”<sup>18</sup>政策議題的觸發機制更為多元和難以預測。“依靠大眾傳播的技術媒體，現代社會的私人領域——特別是私人家庭環境——已成為傳媒化公開性的主要場所。”<sup>19</sup>傳媒化公共事件與私人事件的公共傳媒化使公眾意見有時會為網路塑造而失去了其真實性。公共政策系統的決策過程有被“虛假共識”綁架而失去其現實價值意義的可能。<sup>20</sup>進而，真正的公共政策問題就無法呈現。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趨向於自我的生活世界，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也愈發以自我為中心。社會價值個體化、群體化的結構，使得公共政策問題越來越趨於小型化，政策社群也以不同的規模和方式出現，一致性的問題認知與目標的維持越來越困難。在資訊社會下，在虛擬社會空間與現實社會領域的交匯之中，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決策如何回應這一社會現實，使公共決策系統適應決策環境的變化，優化公共決策品質，提高公共決策的社會接受度，成為公共決策主體必須面對的問題。

政府決策品質（Quality of Government Decision）是指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滿意程度，是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主觀預期與實際感知相比較的結果。<sup>21</sup>如哈貝馬斯所言，“輿論界的政治影響——就像社會權力一樣——只有通過建制化程序才能轉變成政治權力。”<sup>22</sup>但是，“公共意見的‘品質’，是由它的產生過程的程序屬性來衡量的，就此而言它是一種經驗變數。”<sup>23</sup>只有在開放的公共性決策過程

18. [美]查里斯·福克斯等著，楚豔紅等譯：《後現代公共行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1頁。

19. [英]約翰·湯普森著，高銜等譯：《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264頁。

20. [美]大衛·杜魯門著，陳堯譯：《政治過程：政治利益與公共輿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湯瑪斯·戴伊等著，孫占平等譯：《民主的嘲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對輿論的影響力、輿論的政治意義及其權力操縱性給予了分析。

21. 徐曉林等：“資訊技術對城市政府決策品質的影響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06（5），第96-99頁。

22. [德]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在事實與規範之間》，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449頁。

23. [德]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在事實與規範之間》，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449頁。

之中，非正式決策議程的公共性越強，其正式決策的公共性也越具有合法性。電子決策劇場的技術集成系統可以降低因時空因素和能力因素造成的數位鴻溝，提升電子易用性和可用性，緩解技術能力貧困、資訊貧富不均等數位不公問題，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包容等方式推動包容性電子政務的發展。它將網路投票、民意調查、線上協商等電子民主形式應用到具體的公共決策中來。以開放、透明的機制增進決策的公共性，通過公共決策過程的品質提升來保證公共政策文本及其執行的品質。然而，我們並非宣導需要用公眾意見作為公共決策的標準或作為界定政策問題的標準。只是，在開放的決策系統之中，不同的公眾意見可以得到表達，不同的決策價值之間也可以通過電子決策劇場而得到較為充分的展現。從而，實現真正的民主與科學的兼顧。

此外，電子決策劇場的決策分析過程通過運用各學科的、定性、定量相結合的各種技術方法，結合模擬預測等手段，生成多個備選方案。並在充分考慮與研究決策人知識結構、專業背景、理解能力差異的基礎上，全方位地對決策問題進行展示與分析，突破各種認識局限。<sup>24</sup>通過指標性評價、利益相關者滿意度比較以及歷史案例比較等多元評估系統對決策方案做虛擬實境的交互展示及多套方案的立體式比照展示。對每一種政策價值主張做盡量清晰的視覺化比較。使政策的成本——收益結構在更長的政策週期之內得到展現，實現政策備選方案的視覺化選擇。它不僅能夠告訴我們哪些需要以實際的行動去面對，哪些需要象徵性的或符號化的方式去應付。而且可以動態評價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劃定確定政策邊界。從而，實現政策資源更為高效地配置與運用。

## 八、結語

### （一）電子決策劇场的限制與反思

我們對電子決策的分析更多地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它是作為一個理想化的平台而出現的，或者說，電子決策劇場的應用作為一個符

---

24.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電子決策劇場：為科學民主決策導航”，《諮詢與決策》，2011年（2）第44-50頁。

號，它預示著一種新的決策理念和形式。然而，電子決策劇場的功能同樣是有限制的。在一個體制性或系統性構成的意義上，“政策工具不僅能適應環境而作出調整；它們還會具有政策環境的特徵。政策工具也會像政策環境那樣彎曲，並成為政策環境的組成部分。政策工具是與政策環境相融合的。”<sup>25</sup>電子決策劇場作為政策系統的支援性技術平台同樣存在這一問題。它可以作為一種促進機制，實現決策體制的革新和公共決策效能的提升。但是，也可能作為一種抑制機制，作為一種技術障礙而成為決策體制優化的障礙因素。在技術的壁壘之下，也可以製造結構性排斥而強化的政府主導決策議程。換句話說，技術也可能強化封閉的決策體制，強化決策者的集權化決策意識。而參與也可能成為可有可無的選擇。在現代社會複雜多變的環境中，工具理性確實可以帶來高效率的公共行政。但是，它也帶來了一種可能性，即“政府在執行錯誤的政策方面也變得效率越來越高。”<sup>26</sup>而且，在開放而多元的決策過程中，決策責任也更加分散而難以確定，政府官員也將決策責任轉嫁給“不知情”的普通民眾，使決策的約束性責任無法實現。

同時，在某些情況下，技術雖然能影響決策，但卻沒有影響決策背後的判斷。<sup>27</sup>但它並沒有消除差異化的社會價值要求。電子決策劇場一樣存在著多數決策的特性，多數人的暴政有可能在技術的支援之下而顯得更為具有說服力。因而，少數群體或者決策邊緣化群體的需求可能會在多主體決策之中被掩蓋。此外，在技術的引導之下，虛擬實境可能塑造一種非真實的政策願景。尤其是，當決策主體對這一技術形成依賴的時候。而對於這一技術的過度信任也會降低我們依賴直覺判斷或道德判斷的能力。導致人們的“選擇轉移”，而這可能塑造一種群體極化的決策格局，以至使我們陷入“群體盲思”之中。因

---

25. [美]蓋伊·彼得斯等著，顧建光譯：《公共政策工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0頁。

26. [美]菲利克斯·尼格羅等著，郭曉來等譯：《公共行政學簡明教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20-21頁。

27. [美]斯科特·普勞斯著，施俊琦等譯：《決策與判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第180頁。

為，“群體討論通常使人們提倡更冒險的行為”。<sup>28</sup>然而，“我們能夠對混沌系統短時間內的運動進行預測，但我們無法預言在遙遠的未來會發生些什麼。”<sup>29</sup>

電子決策劇場這一平台成為一種公共交往載體，消釋了身份差異與能力差異。借助於資訊技術的“去中心性”的特質，使個體可以將個人話題帶入決策議程。同時，由於社會生活的資訊化，資訊技術也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工具，個體的交往空間借助於這一資訊技術又得到了無限制的擴展。私域的範圍也擴大了。社會網路的範圍的擴展，事件的關注不再以共同在場的方式，依賴於交互性的心理感應來實現社會交往與公共共識。在資訊社會之中，更多的人通過資訊技術而被連接起來，對於公共事務的評價更多地是出於一種共同的經驗性感受來進行表達，換言之情感性的表達代替了理性的表達。“公共管理者也許會發現，與傳統公民發起的接觸相比，公民借助於新技術表達觀點並不那麼具有代表性；或者說，如果由於溝通變得更加便捷了，也許公民傳輸的資訊和表達的觀點缺乏足夠的思考與說服力，只停留在抱怨的層面上。”<sup>30</sup>“在解體的大眾社會裏，公眾只是暫時被整合在一起的，他們相聚一堂只是為了看一場既定的戲劇，然後便四處分散。”<sup>31</sup>這種偽公共性的公共領域反而可能消解了交往主體的公共意識與公共表達意願。尤其是，資訊技術與現代傳播工具非但沒有建立群體化的文化，反而促使文化的非群體化了。<sup>32</sup>公共決策的一致性目標更加難以達成，其公共性特徵也越來越弱。

- 
28. [美]斯科特·普勞斯著，施俊琦等譯：《決策與判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第183頁。
  29. [德]施特凡·格雷席克，胡凱譯：《混沌及其秩序：走近複雜體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9頁。
  30. [美]約翰·湯瑪斯著，孫柏瑛譯：《公共決策中的公民參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6頁。
  31. [德]卡爾·曼海姆著，張旅平譯：《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81頁。
  32. [美]阿爾溫·托夫勒著，朱志焱譯：《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321頁。